



無所不談的坦蕩胸懷—— 星雲大師《貧僧有話要說》的敘事表現與人間實踐

曾金承

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摘要

本文針對星雲大師口述的《貧僧有話要說》討論他如何以回憶說故事的方式，將六十年來的弘法興教，推動人間佛教運動的歷程，記錄成四十說。尤其著重在大師如何將一般人認為敏感的產業、政治，乃至於人際之間的恩怨情仇等問題，都能以胸懷坦蕩，淋漓盡致的說明。本文透過《貧僧有話要說》的敘事表現，以及內容中涉及現實層面的人間實踐之內容進行討論，期望能對大師作品的形式與內容有更多的理解與認識。

關鍵詞：星雲大師、《貧僧有話要說》、敘事、人間佛教、星雲體。



An Open and Candid Heart that Speaks of Everything - Narrative Expression and Human Practice in Master Hsing Yun's "Hear Me Out: Messages from a Humble Monk"

Tseng, Chin-Cheng*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through the oral account "Hear Me Out: Messages from a Humble Monk", employs a narrative style of reminiscence to chronicle the sixty-year journey of spreading Buddhist teachings and promoting the movement of Buddhism in the human realm, documented in forty discourses. It particularly emphasizes how the master adeptly elucidates sensitive issues such as industry, politics, and interpersonal conflicts that are commonly perceived as delicate, with a candid and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hrough analyzing the narrative presentation of "Hear Me Out: Messages from a Humble Monk" and its practical content concerning real-world human endeavors, this paper aims to foster a deeper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of both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the master's work.

Keywords: Master Hsing Yun, "Hear Me Out: Messages from a Humble Monk", Narrative, Humanistic Buddhism, Hsing Yun Style.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一、前言

2015年春天，慈濟基金會規劃於臺北市內湖區的保護區內設置「慈濟內湖社會福利專區」，引發當地民眾及環保團體抗爭的事件，在政黨、環保團體與媒體的交互批判之下，慈濟基金會成為眾矢之的。¹當時臺灣主要的佛教團體幾乎個個自危，深怕被這股風潮所波及，所以噤聲以求自保。在此時，星雲大師卻站出來發聲，寫了《貧僧有話要說》以回憶說故事的方式，將六十年來個人的弘法興教，推動人間佛教運動的歷程，記錄成四十說，以為佛教發聲，他說：

二〇一五年的春天，我因為眼瞎耳聾，視聽模糊，但還是有別人告訴我，報紙、網路、電視對慈濟清算的時候，像颱風一樣，尾巴也掃到佛教各個道場。我一時有感，寫了《貧僧有話要說》，為佛光山、為佛教做了一點表態。後來報章傳播，對佛教有蔓延的攻勢，我也無以去一一的為大家說明，就又再想寫二說。……我基於護教情殷，覺得有些話不能不說。因為佛教是講信仰的，不能讓信徒對佛教失去信心，所以還是有話要說。²

這原本是一件極其世俗的事件，但因為世俗，才是著落於人間，況且又關係到佛教與世俗之間的衝突，不可避免的與大師所推行的「人間佛教」有著密切的關係。

而人間佛教本是著眼於人世，基於此，星雲大師在《貧僧有話要說》中對於人世之中事情可謂無所不談，舉凡一般人認為敏感的產業、政治，乃至於人際之間的恩怨情仇，大師都能娓娓敘來，可謂胸懷坦蕩，淋漓盡致。

¹ 關於「慈濟內湖社會福利專區」事件的爭議始末，可參閱沈倩儀：《試析星雲大師「菩薩性格」的論述—以《貧僧有話要說》為例》（嘉義：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年6月），頁25。

² 星雲大師：〈貧僧有話要說·序〉，《人間福報》，2015年4月1日，<https://www.lnnews.com/news/80468>（2024.03.12 檢索）。



另外，大師透過多年傳教說法的經驗，深知好的說故事方式可以引起讀者或聽者的興趣，進而產生認同感與共鳴。因此，本文也將分析星雲大師如何透過敘事的技巧，將個人六十年弘法的經驗，以及面對各種困境的挑戰與種種的攻擊、質疑，進行誠懇而精采的敘說。因此，本文將針對星雲大師《貧僧有話要說》說的敘事表現，以及內容中涉及現實層面的人間實踐之內容進行討論，期望能對大師作品的形式與內容有更多的理解與認識。

二、《貧僧有話要說》的敘事表現

（一）關於敘事

對於何謂敘事，浦安迪有如下介紹：

什麼是敘事呢？簡而言之，敘事就是講故事。……說到底，敘事就是作者通過講故事的方式，把人生經驗的本質和意義傳示給他人。³

敘事學研究的對象大多為小說，因為小說具有「故事」的結構安排，以及說故事者的角色，也就「視角」。星雲大師的《貧僧有話要說》雖然不是小說，但卻是用「說」的方式表達出來，再由妙廣法師等人記述下來，基本上仍有故事的架構，以及說故事者的視角表現。

胡亞敏在《敘事學》中也對敘事文和戲劇文學與抒情詩的比較，他說：

敘事文與戲劇文學相比，它們都有故事情節，但敘事文有敘述者以及敘事者為中心的一套敘述方式，而戲劇只有人物臺詞和舞臺說明沒有敘述者；

³ 浦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4-5。



敘事文與抒情詩相比，它們都有某種意義上的講述人，但敘事文有一系列事件，而抒情詩雖有詩人或歌手吟唱卻沒有完整的故事情節。經過比較，我們可以初步界定，敘事文的特徵是敘述者按照一定敘述方式結構起來傳達給讀者（或聽眾）的一系列事件。⁴

胡亞敏透過比較的方式，突顯敘事文的兩個並存的特性：敘述者與故事情節。戲劇文學有故事情節，但沒有敘事者，也就是缺乏核心的說故事人物，事件（或故事）具有開放性，接受者（讀者或觀眾）自行解讀戲劇內容為主。敘事文有故事的講述者，對於敘事的目的、結構具有引導性，能主觀的將作者（講述者）的意念傳達出去；抒情詩也有講述者，但著重於意象的表現或情感的抒發，相較於敘事文，欠缺完整性的故事情節或結構。

因此，敘事文學有明確的說故事者，雖然未必是作者，但有著看，或是說故事的角色存在；再進一步而言，說故事者必須要陳述出故事的情節、結構。星雲大師自述早年並不擅長面對大眾講話，是經過長年的經驗累積後，才掌握到對大眾「說故事」的精隨。他在《百年佛緣 02·生活篇二》說：

我是真的從來都不知道要如何講演，因為我一直在寺院裡過著關閉式的生活，到二十歲以後，才有機會見到廣大的社會。雖然大開了眼界，但是與人說話還真的有困難。只要我看到五、六個以上的人，講話就會發抖，相當不自然，在佛經裡有所謂「大眾威德畏」，我就是這樣的情形。……所以我想，這實在需要靠人的毅力來突破，假如我沒有毅力，就不要講話，也不要講演了。但是我深知，如果我不這樣做，就不能弘法；就算有這

⁴ 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11。



樣的畏懼，也要不惜一切地向自己奮鬥。因此從以前畏懼講話，到現今能侃侃而談，我已經進步很多了。現在來了幾千人、幾萬人聽講，也是多多益善，我已經沒有畏懼的感覺了。……我從那個地方學到一個經驗，有時要「以事顯理」，有時要「以理明事」，理事要圓融，要契理契機，思考如何將故事與佛學結合，才是一場最好的弘法講演。這也是我後來一直很用心佛經裡的故事，或人間社會生活小故事的原因。⁵

大師為了面對大眾弘法，不斷的自我磨練，增進自己說話的能力。於是從不善言辭，甚至於是恐懼面對群眾講話的人，慢慢訓練成可以在幾萬人面前侃侃而談。除了勇氣的培養之外，更有著專注學習的精神，靈活的運用故事與佛理相結合，讓聽者先感到興趣並接受故事內容，如此達成弘法的目的。

大師是一位善於說故事的人，但如果只是逞口舌之能，終究只能一時娛樂聽眾，等到事後聽者冷靜下來後，發現除了趣味以外，其餘一無所獲，這樣並不能算是一位合格的講者。大師在面對群眾演講說法時，總能吸引成千上萬的信徒聽講，而且是能夠持續受到聽眾的肯定，舉例而言，大師從 1977 年到 2006 年，連續在國父紀念館辦理 30 年的創新講座，而且每年都座無虛席，這是國父紀念館建館以來未有的盛況。⁶

關於大師的說故事表現，也就是敘事能力，以下分別從敘述者的角色與敘事模式進行討論。

⁵ 釋星雲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世記錄：《百年佛緣 02・生活篇二》（增訂版）（高雄：佛光出版社，2013 年），頁 15-18。

⁶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貧僧有話要說》（臺北：福報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頁 133-134。



（二）「同敘述者」敘事

胡亞敏在《敘事學》中，說明敘述者有如下說明：

敘述者指敘事文中的「陳述行為主體」，或稱「聲音或講話者」，它與視角一起，構成了敘述。

在敘事學中，說故事者就是敘述者，它負有帶領故事發展，透過敘述者的視角，引領讀者或聽眾進入故事的內部的責任。因此敘述者的角色，是帶領讀者理解故事內容的導覽員。

關於敘述者的內涵，胡亞敏分成敘述者與真實作者、暗含作者。在小說中的敘述者常常是故事中的講述者，是作者的代言人，是「真實作者想像的產物」。⁷

這種代替真實作者敘述文本的敘事者在小說中非常普遍，比如魯迅《阿Q正傳》中的「我」就是一個代替作者以旁觀的敘事者角度，冷眼的旁觀、敘說主角「阿Q」的一生故事。不過，相對於小說故事帶有大量的虛構成分，同樣是說故事的《貧僧有話要說》卻非屬虛構的故事，而且說故事者也是談自身的真實經驗、歷程，也就是真實作者。

關於敘述者的人稱部分，星雲大師採用第一人稱的敘事方式，也就是「同敘述者」，胡亞敏說：

同敘述者故事中的人物，他敘述自己的或與自己有關的故事。……他必須講自己的或自己所見所聞的故事。這一點與內聚焦型視角的限制相

⁷ 胡亞敏：《敘事學》，頁37。



同。⁸……同敘述者可以是故事中的主人公，這種居中心位置的敘述者在西方早期自傳體小說中就已經盛行，但在中國白話小說中則鮮見，直到 19 世紀初沈復的《浮生六記》中才有此類敘述者。⁹

以同敘述著的書寫方式，可以將自己的故事做最直接的表達。胡亞敏舉沈復的《浮生六記》為例，認為它是中國白話小說中較早以同敘述著的表現方式。但事實上，沈復在該書的卷一〈閨房記樂〉云：

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正值太平盛世，且在衣冠之家，居蘇州滄浪亭畔，天之厚我可謂至矣。東坡云，「事如春夢了無痕」，苟不記之筆墨，未免有幸彼蒼之厚。……所愧少年失學，稍識之無，不過記其實情實事而已，若必考訂其文法，是責明於垢鑑矣。¹⁰

沈復認為作《浮生六記》的因素是自己生於太平之世，且個人衣食無憂，因而將自己的美好生活記錄下來，以不負蒼天對他的厚恩，接著他說明書寫的態度是「記其實情實事而已」。因此，《浮生六記》不屬於小說，而是自傳。在此處胡亞敏雖對《浮生六記》的文類有誤解，但他強調的同敘述著的書寫方式，寫自己的故事確實是《浮生六記》的書寫方式。

⁸ 關於內聚焦，胡亞敏說：「每件事都嚴格地按照一個或幾個人物的感受和意識來呈現。它完全憑藉一個一個或幾個人物（主人公或見證人）的感官去看、去聽，只轉述這個人物從外部接受的信息和可能產生的內心活動。」參見胡亞敏：《敘事學》，頁 27。

⁹ 胡亞敏：《敘事學》，頁 41-42。

¹⁰ 清·沈復：《浮生六記》（臺北：遠東圖書公司，1984 年），頁 1。



（三）《貧僧有話要說》的敘事者表現

透過上述討論，可知在個人回憶書寫中，以同敘述者第一人稱的書寫方式是可以做最直接表達的。星雲大師在《貧僧有話要說》中，給同敘述者第一人稱定了「貧僧」的稱謂，是有其對敘述者的身分與自覺的目的的。他首先點出過去不寫歡出家人自稱「貧僧」，在《貧僧有話要說》中說：

在過去，中國大陸的出家人都自謙叫「貧僧」，我非常不喜歡這個稱呼，出家人內心富有三千大千世界，為何自甘墮落要做貧僧呢？我童年家貧，甚至三餐不繼，但我從來不覺得家裡貧窮。雖然無錢入學念書，但是我有雙手、雙腳，眼耳鼻舌身俱全，我為什麼要感到貧窮呢？……十二歲出家之後，貧窮的祖庭宜興大覺寺、貧窮的參學寺廟南京棲霞山寺，都是生活艱苦，我也甘之如飴。在六十六年前，我二十三歲到了台灣，無親無故，連找個寺院掛單，都沒有人願意收留，我仍然不覺得貧窮。¹¹

出生在動亂時代的星雲大師認為物質的缺乏不是真正的貧窮，浪跡臺灣時無依無靠的生活也不是貧窮，反而覺得身體健全，內心富有就不能算是貧窮，因此，他原本不喜歡用「貧僧」當作自稱。

直到年近九十時，大師才覺得自己就是「貧僧」，他說：

雖然花費那麼多錢財，成就了那麼多的事業，到了現在年近九十，才感到自己確實是一個「貧僧」。為什麼呢？因為這一切都不是我的，都是大眾

¹¹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貧僧有話要說》，頁 10-11。



和社會共有的。……本來就為十方財物，我孑然一身，不是「貧僧」又是誰呢？……因為貧僧不積聚金錢，所有一切，都歸公佛光山教團所有，甚至信徒給我的紅包，我都拒絕，很安然的做我一生的「貧僧」。我覺得享受貧窮也是一種快樂。……佛教徒大多守貧，縱有公共的寺院財富，亦為寺院所有、社會共有，都用之於社會大眾。……不過貧僧也知道，我能安於貧，所以能建設很多的寺院；我能安於貧，所以有那許多人緣。¹²

後來，在成就許多事業後，大師了悟這一切都不是自己的，所有的財物來自十方，他只是將這些資源用到宗教，成為教團、社會所共有。一切物質都不屬於自己的，那麼稱為「貧」也就名正言順了，況且自己的貧反而能造就佛教事業，故而樂於以「貧僧」自稱了。

星雲大師以第一人稱同敘述者的「貧僧」角色，敘說自己的故事，形成「內聚焦型」的人稱敘事模式，這種特殊模式在敘述故事有其優勢，胡亞敏說：

這種聚焦類型由於是從人物的角度展示其所見所聞，因而具有種種優勢。在創作上它可以揚長避短，多敘述人物所熟悉的境況，而對不熟悉的東西保持沉默。在閱讀中它縮短了人物與讀者的距離，使讀者獲得一種親切感。¹³

以第一人稱的內聚焦敘述方式，可以將個人的內心想法、經驗直接的展現，把他人所容易誤解，或是自己亟需解釋的部分合理的陳述出來，也就是讓聽眾得到當事人的第一手訊息。

¹²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貧僧有話要說》，頁 12-15。

¹³ 胡亞敏：《敘事學》，頁 27。



星雲大師長期以來被外界所質疑的重點之一就是出家人與政治關係太近，甚至於被扣上「政治和尚」的帽子，關於此事，大師有個人的說法：

然而後來，社會開始有人稱我為「政治和尚」，實在很意外。那個時候，貧僧心中稍有芥蒂，因為我一生不好政治，始終與政治保持距離，我也不要做官，也不向政府要求補助，應該和政治扯不上關係。你不能因為政治人物來對我訪問、談話，或者交個朋友，或者因為我關心社會、關心民眾，因此就稱呼我「政治和尚」，這也太諷刺了吧，在我心中，我不是政治和尚啊。……後來，有一位電影界的導演劉維斌先生，他對我說：「你不要介意，政治和尚，這是人家對你的尊敬；有的人已經做了民意代表，別人還不肯稱他『政治和尚』。稱呼『政治和尚』，表示你很有力量，能為群眾講話，你很能為社會尊重。」從此以後，我對「政治和尚」這四個字也就釋懷了。¹⁴

傳統上，大家認為出家人是必須清修的，就算入世，也盡量不要過多的涉及俗事；而政治原本是關乎眾人之事，也是天下之大事，但因為長期以來政治人物的形象不佳，導致在一般人的觀感中，政治總是脫離不了貪婪、黑暗的印象。如此，當一個世俗觀念中本應清修自持的出家人被政治扯上關係後，自然容易產生負面的形象。大師在書中以自我檢討，尤其是個人的委屈、無奈與抗拒，都能詳實的反應個人的內在心聲。接著在經過友人的安慰後，大師才轉念釋懷。這樣的心路歷程與轉折，若非第一人稱同敘述者則無法精準且有說服力的傳達。

在分析「政治和尚」稱謂的由來，大師也坦白的自剖道：

¹⁴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貧僧有話要說》，頁 185-186。



會有「政治和尚」這一詞，大概由於我曾經是國民黨的黨員；……在十八歲的那一年，中日戰爭結束，國民黨和共產黨抗戰勝利，在我們佛學院的講師名單中，有一位講公民課的老師，口才相當，雄辯滔滔，非常受我們同學的敬重。有一次，他叫我們全體同學都參加國民黨，做國民黨的黨員。我也不知道做一個黨員，會有什麼權利、盡一份什麼義務，他只是發給每一個人一張黨員證書。……當我二十三歲到了台灣，一、兩年後，那時，國民黨有「黨國元老」之稱的李子寬老居士，……他就對我們說：「你們法師，要想在台灣弘揚佛法，不給政府認同，恐怕難以活動，我勸你們，統統參加國民黨做黨員吧！」一九八六年，國民黨召開「三中全會」，蔣經國先生做總統，指名要貧僧出席，並且要在會中發表講說，……於是我提出幾點建議：第一，我希望政府開放，讓台灣的大陸人士能回到大陸去探親。……第二，我希望國民黨要開放，不要只有一黨專政（那個時候還沒有民進黨）；……第三，我希望讓佛教來辦一所大學。第四，我希望國家要發展體育。……後來，據聞蔣經國先生有所改變，陸續開放大陸探親、解除戒嚴，並且有人告訴我：「你一個和尚，都希望如此，他當然有所裁決。」我們知道蔣經國先生不容易聽信部下的建議，因為我是一個和尚，不是他的什麼部下、官員；當然，和大陸往來，我不敢居功，也非我個人的能力所及。……太虛大師在抗戰勝利初期，……提出一個佛教今後對政治的主張：「問政不干治」。我對太虛大師的高見，舉雙手贊成。¹⁵

大師自述從年輕時在懵懂的情況下加入了國民黨，後來到了臺灣之後，國民黨員的身分讓他的弘法工作較為順利，可見他當初加入國民黨時完全沒有政治動機，

¹⁵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貧僧有話要說》，頁216-221。



而且是為了佛教事業。後來也因為在社會有了影響力，被國民黨邀請出席「三中全会」並提出建議，這些建議都是基於人道、民主、教育等面向考量，並獲得正面回回應，可見政治如同一把雙面刃，端看如何使用。最後再以太虛大師的「問政不干涉」之主張，表明他的政治態度，也就是關心、建議，但不干預政治。大師花了極多的篇幅解釋「政治和尚」稱謂的由來，除了也提出自己對於這個稱謂的看法之外，更進一步提出他對政治的主張以及關懷政治的正面效益。這樣的細緻描寫個人經歷與內心感想，也是由第一人稱的敘事角度所精準傳達。

另外，大師在《貧僧有話要說》的敘事角度，也可以傳達一些不為人知的小故事，他在〈我一生「與病為友」〉說：

像有一次，貧僧應邀到基隆做一場講演，因為感冒，咳嗽不停，一位信徒知道了，自稱有特效藥，可以一針見效。我雖然不喜歡打針吃藥，礙於演講在即，也不喜歡拒人於千里之外，就答應他了。哪裡知道，這一針打下去之後，膀子竟然舉不起來了，連脫衣服都困難，只有忍耐，幾乎花了一年的時間，才漸漸好轉。掛念這個信徒會被人責怪，也一直不敢說，至今這個信徒是誰，我都不敢告訴別人。¹⁶

這樣一個體貼他人的故事，透過個人的敘述，不僅把事情的前因後果交代清楚，也可以看出大師為人的體貼，並肯定他人的善意。這種對事件清楚的交代與內心的決定與諒解，出自第一人稱的直白敘述、感受，更具真實性。

¹⁶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貧僧有話要說》，頁 539-540。



(四) 《貧僧有話要說》的敘事方式

星雲大師的《貧僧有話要說》是因為慈濟功德會的內湖開發案所引發的爭議而「說」。因為外界幾乎是以清算的方式攻擊慈濟，站在同樣是佛教團體的立場，大師認為應該就佛光山的發展歷程跟大眾進行說明，他說：

這四十說旨在說明，在六十年前，我從宜蘭度化青年，用音樂、歌唱、舞蹈，啟動人間佛教弘傳的開始，到一九六三年在高雄創辦佛教學院，接引一些青年學佛、出家，培養佛教人才，共同推動人間佛教的運動。後來，又遷移至佛光山，如今，佛光山開山也有五十年的歷史，佛法也遍傳全球五大洲了。¹⁷

《貧僧有話要說》是大師口述的回憶錄，聚焦在個人弘法與處世的經驗，具有說故事的敘事形式。而要如何說一個好的故事，端賴說的敘事模式與安排了。

在《貧僧有話要說》中，大師經常先在該講的開頭做簡要的說明，有時直指主題，有時從側面切入，但都能引起聽者的興趣。比如在第五說〈雲水僧與雲水書車〉開頭云：

貧僧的名字叫「星雲」，星星高掛在天上，白雲飄浮在空中，我也不願意登在天上，也不願意掛在空中，好在出家人一般都稱「雲水僧」。水，流在山間小溪，匯成江河湖海，覺得「雲水僧」也非常適合貧僧做另一個名字的稱呼。¹⁸

¹⁷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貧僧有話要說》，頁 3。

¹⁸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貧僧有話要說》，頁 58。



大師從自己的名字談起，強調雖然稱「星雲」，但卻更喜好「雲水」的流動感與匯集成江河湖的影響力，這是從正面直指切入的模式。接著，大師開始談信徒點滴匯聚而成的「雲水醫院」、「雲水書車」等。

又如〈貧僧受難記〉的開頭云：

貧僧近九十年來的歲月，面臨生死的邊緣，從鬼門關又走回來，也不知道走多少次了，有些也不值得敘說。比方說掉進冰窟，還能自我爬起來，雖是奇異，但也不值一說；也曾騎自行車，從三層樓高的小丘陵，衝到深溝，車子跌得粉碎，人絲毫無傷，這也不值得一談。甚至在戰爭中，槍林彈雨，多少次的死裡逃生，好像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貧僧還是有許多受難的過程，在此一說。¹⁹

本篇開頭就回顧自己一生所經歷的各種磨難，不管是掉入冰窟，還是在槍林彈雨中的死裡逃生，樁樁件件都是千鈞一髮的生死關鍵，大師對這些經歷，用了平常的語氣進行正面開頭，表現對生死看淡的態度。接著再一一列舉自童年被師父開除、青年時期在亂世中受到國、共兩黨的迫害，幾乎莫名其妙的喪命等故事佐證。

另外也有從側面小事開頭，再慢慢進入主題的方式，如〈我怎樣走上國際的道路？〉開頭云：

貧僧自從童年出家後，自覺沒有什麼好的因緣培養自己的前途，最早的志願，只想在佛門裡做一名飯頭僧。因為在棲霞、在焦山時，偶爾客串典座（煮飯菜），大家都交口稱讚，貧僧感到自己對調理飲食有一些天分。²⁰

¹⁹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貧僧有話要說》，頁 152。

²⁰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貧僧有話要說》，頁 118。



大師以童年出家時，初時的志願只是當一個為大家服務餐飲的飯頭僧。這樣的故事起頭，似乎與「走上國際」有很大的差距；但再細品字裡行間的訊息，我們可以知道那是在童年「沒有什麼好的因緣培養自己的前途」的前提下所立的「志願」，因此，在後面的故事中，大師強調的是只要有好的因緣，他是樂於發展更大的志願。另外，做飯頭僧也是一種服務他人的機會。因此，故事的發展就會循著把握因緣與服務大眾的面向擴大，從服務一寺的僧人擴大到服務全球信眾，誠如他在本單元最後表達心聲的四句話：「心懷度眾慈悲願，身似法海不繫舟；問我一生何所求，平安幸福照五洲。」²¹

大師在《貧僧有話要說》經常在開頭就點出主題，讓讀者掌握本講的方展方向，或是從側面切入，起頭貌似與該講不相干，這樣反而能引發讀者更大的好奇心，接著再慢慢導入主題。

前文提到大師是一名善於說故事的人，尤其是在講經時更是如此，王雪卿說：

（星雲大師）以淺顯易懂、隨處可拾的生活經驗來講解經典之奧義，如以酸與甜存在於同一顆鳳梨之中為喻，說明「煩惱即是菩提，菩提即是煩惱」；以表演者與電視機之關係為喻，說明「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之佛理等等，皆可看出他擅與現代人生活經驗連結，充滿人間性、社會性、生活化；善喻善譬，隨機指引，廣開方便法門，以接引普遍社會大眾的講經風格。²²

大師也將講經的成功模式運用於日常的回憶敘述，尤其是生活經驗的連結更是如同信手拈來，不著痕跡，且十分貼切。

²¹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貧僧有話要說》，頁 126。

²² 王雪卿：〈星雲大師《六祖壇經講話》講經風格研究〉，《通識教育與跨域研究》第 23 期，2021 年 6 月，頁 34。



大師在《貧僧有話要說》的主體內容經常採取有層次的深入敘說，當中再插入一些個人故事、經驗為例，這樣自然容易生動、有趣，且具有真實性，聽眾自然也就樂於接受，以〈我弘講的因緣〉為例：大師先說明年少時有弘法的動機，但當時「還沒有用道傳教之前，我就先用文字來傳教，」²³那時，大師編過《怒濤》雜誌，也做過《霞光》半月刊主編。到了臺灣後，除了繼續寫文章傳道之外，也開始試著講經，那時候「每天聽眾也有兩、三百人，只增不減」。²⁴大師也是在此時體會到以佛經故事或人間生活小故事才能吸引聽眾進入佛法的領域，這是大師弘講的初步開端。接著大師分享宜蘭的十年講經弘法經驗時，夾入一個小故事：煮雲法師當時也發表一些批判媽祖的言論，星雲大師勸他，如果沒有媽祖的信仰，當地沒有法師，也沒有佛法，當然就會大多歸信天主教、基督教了。所以媽祖是為佛教守住台灣這一塊土地上有佛教的善根善緣。²⁵這也強調了傳教時要能有更大的包容，才能得到認同。也因此十年後，大師陸續走入台北的國立藝術館、中山堂光復廳演講，聽眾已達千人以上。後來，在不斷的累積經驗與因緣俱足的條件下，大師也到國父紀念館進行三千人的講座，之後更到香港紅磡體育館進行兩萬餘人的講座；因為紅磡體育館的成功的因緣，大師得以持續進一步向世界各地弘法。如此的敘說，條理分明，層層深入，有能偶舉生活事例或個人經驗融入其中，達到「以事顯理」之效。

另外，〈我的小小動物緣〉是一篇以輕鬆的故事構成大師重視生命權的作品。大師先從自己從小就培養的愛心、慈悲觀念談起，先舉人人厭惡的蚊子為例：「蚊子咬我，我會捏住牠的腳，一分鐘後放了走，以此當作處分」，²⁶而不會因為蚊

²³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貧僧有話要說》，頁 130。

²⁴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貧僧有話要說》，頁 131。

²⁵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貧僧有話要說》，頁 132。

²⁶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貧僧有話要說》，頁 243。



子吸了自己一口血，就一掌奪去牠的生命。接著也舉許多大師與動物間的小故事，小到童年養的小雞、小鴨，大到渡海弘法後在宜蘭養的猴子、佛光山養的狗等，都有通人性的事蹟，甚至於連松鼠、飛鳥也都如此。大師在講這些故事時，有都能舉出有趣、感人的故事佐證，比如小狗「來發」的故事：

一九七四年八月，世界青棒錦標賽在美國開打，中華隊球員李來發打了一支二壘安打，正當大家在電視機前歡喜狂歡、鼓掌的時候，鄭碧雲師姑抱來一隻兩個月大的小狗，對我說：「請師父替這隻小狗起個名字。」

我本來有個規定，佛光山不許養動物，因為動物跟人有了感情，彼此容易牽掛。那時候，大家看轉播看得正投入，我是熱愛體育之人，當然也是聚精會神，忽然聽他這麼一說，為了慶祝李來發的二壘安打，就漫不經心的說：「那就叫『來發』吧。」

從此以後，近六年，這條狗不肯離開貧僧了。……那幾年，你來佛光山，找我找不到，只要找到來發，就能找到我。

我上課，牠蹲在下面；我拜佛，牠跟著我拜佛；我主持皈依，人家跪地禮拜，牠就在每個人頭頂聞一聞，……我覺得不妥，想叫人把牠送走，哪裡想到，牠知道後竟然數日不吃不喝，為了安慰牠，不得已，只得讓牠再留了下來。

尤其來發好跟車，每次我要到台北弘法，牠不知道從哪裡知道，總會偷偷先上車，躲在車子座位底下，等到車子開到半途才冒出來。

這個故事相當有趣且神奇，從小狗名字的由來，以及與大師的情感之深，再到來發能通人性、拜佛等點點滴滴的故事，都能引人入勝。



三、《貧僧有話要說》的人間實踐

(一) 慈濟事件與人間佛教

關於慈濟園區所造成的衝擊應對方式，大師在《貧僧有話要說》一方面區隔「社團」與「教團」的差異，一方面強調入世的人間佛教對社會的貢獻，希望藉此導正社會視角上的盲點。

在區隔「社團」與「教團」方面，沈倩儀說：

社團與教團在性質上大不同，所以在運作方式上也不能以偏概全，一概而論。既然慈濟功德會是社會慈善團體，社會大眾就應用社團的概念去理解，而並不是用佛教寺廟道場的概念去評斷。大師此舉可達到防止有心破壞佛教者乘機借題發揮，誤導普羅大眾之效用。²⁷

慈濟功德會是屬佛教的社會慈善社團，它的運作是以社團模式為主，推動的「慈濟內湖社會福利專區」也是以社會福利為主，所引發的爭議，並不能表示佛教教團對環保的忽視。簡而言之，社會上的確是存有對佛教不友善的人士，他們將佛教團體的一切作為都存有偏見，甚至於刻意做不必要的連結，藉以打擊佛教。以「慈濟內湖社會福利專區」為例，就是刻意將慈濟（佛教）與生態破壞、關說、竊佔國土、財團等負面價值畫上等號，或形成連結。

面對這些惡意的連結，大師藉此書寫《貧僧有話要說》，向社會大眾說明佛教的立場與本質，為了避免流於片面，且不至於將焦點停留在慈濟功德會的單一

²⁷ 沈倩儀：《試析星雲大師「菩薩性格」的論述—以《貧僧有話要說》為例》，頁 27。



事件上，他有話就完整的說。根據沈倩儀《試析星雲大師「菩薩性格」的論述—以《貧僧有話要說》為例》的統整，《貧僧有話要說》共計有七個主題，即修行觀、待人處事觀、生命觀、金錢觀、弘法觀、宗教觀及社會道德觀。²⁸

這些主題，有的可以回應當時社會對佛教的現實質疑，如修行觀中有第三十說〈我訂定佛教新戒條〉、第三十二說〈僧侶修持的回憶〉強調修道者的發心立願以及修行所須遵行的新戒條；待人處事觀中有第七說〈我的歡喜樂觀從哪裡來〉，大師強調個人願意為大眾奉獻付出，並以為喜樂，此為人間佛教的利他樂己；生命觀如前述第十八說〈我的小小動物緣〉的佛教尊重眾生平等之生命，以及第四十說〈真誠的告白——我最後的囑咐〉中大師說明自己一生都以人間佛教思想為目標，並希望未來佛光山都能承續這樣的思想；金錢觀如第二說〈我對金錢取捨的態度〉說明佛教修道者應該淡泊簡單，不為金錢所羈的態度，第三說〈我究竟用了多少「錢」？〉除了說明佛光山的財產之外，更強調慈善是佛教徒的責任，也是慈悲之展現；弘法觀如第九說〈我怎樣走上國際的道路？〉大師克服各種障礙向世界各地傳遞佛法，第十說〈我弘講的因緣〉強調大師採用各種方便法門，將弘法事業傳遞到社會各階層中；宗教觀中最特別的是第十七說〈神明朝山聯誼會〉，說明大師的眾生平等，相互尊重，互相包容與互不侵犯，具備寬闊共存的宗教融合理念；社會道德觀如第二十三說〈我的平等性格〉中，大師強調佛教的信仰就是平等而非差別，不應有男女的尊卑，以及貢高的出家人自以為高於在家眾的現象，應如《金剛經》中所云：「無我相、如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

以上七個主題皆可實行於人間世，可謂人間佛教的實踐方針。但是，如果再更具體追問什麼是「人間佛教」？大師也給了簡要的答案：

²⁸ 沈倩儀：《試析星雲大師「菩薩性格」的論述—以《貧僧有話要說》為例》，頁 28。



我一生，以弘揚人間佛教為職志，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凡有助於增進現實人生的教法，都是人間佛教。……我堅信人間佛教必然是未來人類世界的一道光明。說好話是真，做好事是善，存好心是美，讓三好運動的真善美要在社會裡生根。智就是般若，仁就是慈悲，勇就是菩提，要努力做到，讓戒定慧在我們的心裡生長，以實踐菩薩道作為我們的修行。²⁹

人間佛教自然是基於佛教的基礎，自然是以「佛說的」為首，但佛說的一切要實踐在人的身上，故而「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都要落實於人間，落實的方式不外乎「三好」與智仁勇。以慈濟功德會的「慈濟內湖社會福利專區」引發的過度爭議而言，星雲大師面對鋪天蓋地的聲浪時，他挺身為佛教說真話，存著善心為教做些事，在當時的環境下，這需要大智慧與不動的慈心，以及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也是智仁勇的表現。

從前述《貧僧有話要說》共計有七個主題，到大師所闡釋人間佛教的「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凡有助於增進現實人生的教法，都是人間佛教」。這是以佛說的思想義理為中心，並落實到人間的模式，稱為人間佛教。淨會長老更提出「星雲模式」就是實現「人間佛教」的系統工程，³⁰他在〈應機施教與時代精神〉說：

星雲大師平生以追蹤往哲、振興佛教為己任。星雲大師把人間佛教思想奉為圭臬，數十年來身體力行，使佛教與人生打成一片，同時代並行不悖；

²⁹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貧僧有話要說》，頁 581。

³⁰ 關於「星雲模式」的闡釋較具體提出是釋滿義於 2005 年出版《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其探討星雲大師對人間佛教做法與推展特色的模式，有歸納出四點弘化方式不同：「說法的語言不同」、「弘化的方式不同」、「為教的願心不同」、「證悟的目標不同」。詳見釋滿義：《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台北：天下文化，2005 年）。



他所開創的佛光山事業，實際上是實現人間佛教和佛教現代化的一個系統工程，可以稱之為「星雲模式。」³¹

從星雲模式的與時俱進思維、行動，促成了人間佛教的推行，也就是佛教與人生能夠打成一片的佛教人生化。人生原本就是在不斷變化、推進的，佛教要能與時俱進，與時俱變，並且能回應時代的需求，讓世人了解佛教的內涵，這就是人間佛教，也是《貧僧有話要說》能夠從慈濟產生的爭議出發，進而完整性的對社會做出回應，提供世人了解佛教的真正內涵。

（二）「世俗性」真心話

閱讀星雲大師的作品有種不同於傳統對宗教文章的拘泥感受，反而能在暢快淋漓的閱讀中了解佛學的真諦。關於大師的文字風格與內容，筆者曾在〈從《合掌人生》論「星雲體」的建構〉一文中提出看法，歸納其內容有「無所不談的題材」、「無所不包的內容」、「人間佛教的思想」；至於形式特徵，則有「以手寫口，質而不俚」、「段落簡潔，句式簡短」的特質。³²整體而言，就是以人間佛教為思想核心，坦蕩的胸懷書寫各種題材的內容，用字簡潔且親切。

前述所敘的內容，無外乎就是合於人間世的「世俗性」特質；確實，《貧僧有話要說》從創作動機到具體完成的內容都是充滿世俗性的。

首先，動機就是因為「慈濟內湖社會福利專區」所引發的各種爭議，這些爭議從環保問題開始，接著引發許多世俗性的問題，如違建、竊占國土與財務問題等。其中尤以財務問題一直受到有心人士或團體窮追猛打，比如在 2015 年 5 月底

³¹ 釋淨慧：《中國佛教與生活禪》（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 年），頁 71。

³² 曾金承：〈從《合掌人生》論「星雲體」的建構〉，《文學新論》第 27 期，2018 年 6 月。



的《今周刊》還專文批評慈濟的財務是最不公開的。³³因此，星雲大師認為同為佛教團體的佛光山有必要針對社會上的各種質疑提出說明。

在財務方面，大師先「坦白」佛光山的財產，並闡述一生的佛教事業，尤其是佛光山興辦的文化、教育、慈善事業等，都攤在陽光下向社會大眾及信徒說明。

在討論佛光山有多少錢，或是多少財產之前，大師先在〈我對金錢取捨的態度〉提出了四條他的金錢觀：

第一、在我的思想裡主張，要「儲財於信徒」

第二、興辦文教事業，要讓佛光山「窮」

第三、珍惜信徒淨施的發心

第四、布施要不自苦、不自惱³⁴

第一點「儲財於信徒」是不讓信徒超額捐款，信徒富有了，佛教才能富有。就如同大師在〈我究竟用了多少「錢」〉所云：「『百萬人興學』每人每月新台幣一百元，為期三年，讓大家在辦教育的理念，增加自己的品德」。³⁵讓信徒都能負擔得起的金額，既不「窮」了信徒，又能讓十方信眾都能為了興學盡一分力；辦文教事業，要讓佛光山「窮」，所謂的窮，就是要讓錢大量支出在辦大學、雲水書車、雲水醫院、辦報紙、辦電視臺等文教事業，將錢用在這些有益的地方，因此自然會窮，窮了，才會精進不懈，力爭上游，免於安逸；珍惜信徒的淨施發心

³³ 今周刊在 2015 年 5 月專文標題：〈慈濟、綠色和平、家扶 財務最不公開〉，文中寫著：「二〇一三年收受捐款高達九十八・三億元的慈濟基金會，雖幾度遭批評，至今仍未公開財務報表，僅在網路公開簡略支出狀況，與針對緬甸、尼泊爾、四川等募款專案的收入支出總額。」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2/post/201505210018/> (2019.11.07 檢索)

³⁴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貧僧有話要說》，頁 26-28。

³⁵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貧僧有話要說》，頁 39。



強調的就是不以奉獻金額的多寡而有差別心，珍惜每位信徒的供養；布施要不自苦、不自惱就是不讓信徒有負擔與壓力，能夠歡喜布施，才能長長久久。

基本上，從大師所主張的四條金錢觀就可以推知大師的兩個重要原則：不囤積錢財，不造成信徒負擔。將錢財用於各種宗教、公益文教事業，不將大量錢財留在佛光山，此則取之四方，用之四方，除了可免除許多不必要的困擾之外，更能促使弟子奮發向上；信徒在有限的範圍內布施，才能長長久久，更不會因為信仰而造成個人、家庭的困境。

大師在說明自己對金錢取捨的態度之後，接著就順此態度說明佛光山的錢財使用以及產業規模。

關於佛光山的錢財使用，大師也在〈我究竟用了多少「錢」？〉做了說明，當然，如同前面所述，當時社會對慈濟功德會的事件所引發的不信任感首先就呈現在對財務的質疑，所以大師在詳述帳目之前說：「現在社會都叫人要公開帳目，貧僧個人的私帳沒有，但公有的財富卻有不少。」³⁶接著坦率地一一列舉辦理辦學所耗的費用，筆者依大師列舉的數字統計，總計大約 240 億左右；大師有自己統計「善財辦報 15 年補貼 20 億」，佛光衛視花費 30 億以上，編輯經藏、出版刊物等，大概就花費了百億元以上，至於 60 年來的救災濟貧等，應該也花費了百億元以上，這些數字初估也已 400 億元以上了。

大師直白無隱地將幾十年來佛光山的花費做了說明，除了向社會大眾交代之外，也呼應了他在〈我對金錢取捨的態度〉所強調的「興辦文教事業，要讓佛光山『窮』」。大師大方的讓社會大眾知道佛光山有錢，但都只是「曾經」有錢，這些錢都已投入各種公益事業，也就是隨時都保持在「窮」的狀態。

³⁶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貧僧有話要說》，頁 36。



另外，如同慈濟功德會一般，社會上有些人對於佛光山的寺產與事業的經營也多有批評，大師也在〈佛陀紀念館的風雲錄〉做了簡要說明。社會上一直有批評佛光山的建物不合法的聲音，大師解釋道：

佛陀紀念館的本館、佛光樓、佛光大佛早已正式取得使用執照，但社會少部分的人，一直以佛館的山門、牌樓未有建築執照而批評詬病。那只是佛館的景點，並沒有人居住，也正在辦理執照中，只是山坡地開發、水土保持的行政程序曠日費時，時間來不及，信徒、遊客就蜂擁而來，我們阻止好呢？還是開放好呢？感謝高雄市政府的領導單位，諒解我們為社會服務的苦心，協助我們補辦執照。我們也不想擁有特權，只是時間遲了一些。我們又不圖名、又不圖利，我們又有那麼大的罪過嗎？³⁷

大師除了解釋主要建築物都已取得使用執照之外，也承認山門與牌樓確實尚未取得建築執照，但因為並非居住的建物，而且無危險性，再加上信徒殷切期盼且蜂擁而來，故而先行開放再補照。大師坦率承認確實存在著缺失，但並未存在特權的問題，而且一切純屬付出，不為名利。

另外，關於佛光山被外界評為商業化的問題，大師也有說明：

做了一些事，才稍有成果，就有人批評：「佛陀紀念館一進門有零星的攤販、漢來素食餐館、星巴克……商業氣息太重了。」孰不知，如果沒有提供吃喝以及店家經營紀念品的地方，遊客來了、信徒來了，累了、渴了、餓了、想要購買禮物等等，你想，應該如何替他們解決問題呢？³⁸

³⁷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貧僧有話要說》，頁 53。

³⁸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貧僧有話要說》，頁 54-55。



大師一直很了解外在對佛光山的一舉一動都是以放大鏡檢視的態度，他也都知道外界質疑的事物為何，並且能直接進行說明。不過，更重要的是，當大師知道一些事實上合理的事情，一旦佛光山做了就勢必被外界貼上標籤時，他還是毫不畏懼的願意去做。誠如大師在《這是勇者的世界》中所說：

其實唇槍舌戰非我所願，
況且言行招忌，只會帶給自己更大的阻力，
然而佛教所以能流傳千古，
不就因為一些只問是非，不問利害的佛門龍象嚴持正義，
奮鬥爭取而來的嗎？我豈能愧對歷史！³⁹

大師不好口舌之爭，但在該捍衛佛門之時，他都能勇敢地站出來，以坦蕩的態度去面對、去爭取。

大師在《貧僧有話要說》也能勇敢且坦蕩的胸懷，明白的「說」許多往事，除了如上文所說的「政治和尚」稱呼之外，也包括許多過往較為敏感的事件，誠如司馬光所說：「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⁴⁰

大師在書中屢次提及被打壓的往事，如〈貧僧受難記〉寫到白聖法師以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的身分阻礙大師出國訪問的機會：

有一次，越南的禪定法師知道台灣的情況，特地專函邀請我到越南，參與他們的社會福利基金發展會議。……白聖法師一見到我就問：「你來幹什

³⁹ 星雲大師：《這是勇者的世界》（新北：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年），頁182。

⁴⁰ 元·脫脫等《宋史·列傳95》（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頁4165。



麼的？」我說：「越南也邀請我去開會，我想來參加出國會議啊！」他又對我說：「我們大家都不歡喜你，你回去吧！」……所以就走到火車站，搭火車回到高雄。抵達時都已經是傍晚了。⁴¹

這是年輕時的星雲受到排擠的經驗，類似的經驗還有因文章而引發的批、指責，在〈我寫作的因緣〉中提及一段往事：

然而這些基於護教而發表的文章，也為我帶來一些漣漪。例如，一篇文藝短篇小說〈茶花再開的時候〉，秦江潮先生專程來為我指教；一封寫給京劇名伶顧正秋女士的信，抗議他在永樂戲院演出有損佛教形象的戲劇，引發了軒然大波。尤其我寫了一封信給朱斐居士，批評他不該把太虛大師的《覺群週報》，改作紀念印光大師的刊物，也引起了對我很不利的反應，導致他把《覺群》停刊，另創《覺生雜誌》。另外，一篇短文批評《中華佛教美術》所刊出的佛像，把頭腳切斷，是對佛教不敬，招來東初長老對我的不滿。甚至佛教同道間的指責，也從四面八方紛至沓來。⁴²

一般情況下，對於過往的恩怨或爭議事蹟，大多人都會選擇隱晦帶過，也不會直指當事人姓名，免得招來更多的困擾。不過，星雲大師對於往事的書寫，尤其是涉及佛教或公眾事務，不論是好是壞，都能盡量詳細說明其人、事、時等，展現其坦蕩的性格。

不過，如果事情涉及個人，且不利他人時，大師轉而言事而不論人，比如在前文〈我一生「與病為友」〉中說過在基隆演講時，因為信徒的善意建議而打了

⁴¹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貧僧有話要說》，頁 164。

⁴²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貧僧有話要說》，頁 480。



一針，結果造成一年病痛，但大師卻不願說出信徒姓名的這件往事便可知大師慈悲為懷，對於信徒善意所造成的傷害，不但不怪罪，甚至極力保護。除此之外，也可以從上述事例中得知大師是一位公私領域極度分明的人，當面對個人的私領域時，都盡可能低調並站在維護當事人的立場，但在公共事務時，則一切透明，甚至於還曾有拍桌、拂袖而去的舉動。⁴³

大師對於世俗性的問題無所不談，且能直言無諱的具體說明，修行於人世，更著落於人間，透過《貧僧有話要說》的四十講，對自己的修行經歷、佛光山的發展，以及社會大眾關心的佛教事業及相關資產等，面面俱到的向大眾說明。

四、結語

《貧僧有話要說》的成書，不可諱言是源於「慈濟內湖社會福利專區」的爭議，但星雲大師如果只是針對此一事件而費了四十講進行辯說，格局則太小。事實上，大師的《貧僧有話要說》與其是為了慈濟引發的事件而說，不如視為是為了佛教而說。大師在書中以第一人稱的「同敘述者」角度進行言說，與本書的書名所持的視角相符合，這樣的視角具有真實感，可以拉近與讀者的距離，使讀者在閱讀中得到親切感與真實感。

當讀者對作品產生信任與親切感之後，大師所談的內容就容易進入讀者的內心。不過大師接著並未「乘勝追擊」大肆為佛光山及個人宣揚，反而是率先談最

⁴³ 大師在〈貧僧受難記〉也提及一段往事：「美國的沈家楨居士邀請我擔任『密勒日巴學人獎學金』的審查委員，每次從高雄到台北開會，都有六百塊錢的車馬費。但是有一次，我認為論文的獎金應該要提高，因為重賞鼓勵之下，才有人願意為佛教著書立說，只有三千元，要人寫五萬字的論文，實在微薄，應該要五萬元。但是主席南亭法師，三番二次的叫其他委員不可以聽我的話，並且怪我不可以有如此的建議。因為同樣的態度欺壓，一而再，再而三，終於讓貧僧那時候年輕氣盛的火，不能忍耐，桌子一拍，就說：『你憑什麼倚老賣老！』便拂袖而去。」詳見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貧僧有話要說》，頁 163。



「俗氣」的，也是大眾最關注的錢財觀，並進而向大眾坦誠說明佛光山幾十年來錢財的流向；甚至連一些社會上對其個人與佛光山的質疑、攻擊，都坦然面對，進行說明，可為具備大智大勇的真言。誠如林光耀在該書的書底推薦文中所說：「他為佛教未來發展鋪設的路，毫無保留寫於《貧僧有話要說》。大師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振興人間佛教、建設新佛教文化與教育事業。」

五、參考文獻（依出版時間排列）

（一）專書

- 清·沈復：《浮生六記》，臺北：遠東圖書公司，1984年。
- 浦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
- 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 釋滿義：《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台北：天下文化，2005年。
- 釋淨慧：《中國佛教與生活禪》，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
- 星雲大師：《這是勇者的世界》，新北：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年。
- 釋星雲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世記錄：《百年佛緣 02·生活篇二》（增訂版），高雄：佛光出版社，2013年。
-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貧僧有話要說》，臺北：福報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二) 期刊論文

曾金承：〈從《合掌人生》論「星雲體」的建構〉，《文學新鑰》第 27 期，2018 年 6 月。

王雪卿：〈星雲大師《六祖壇經講話》講經風格研究〉，《通識教育與跨域研究》第 23 期，2021 年 6 月。

(三) 學位論文

沈倩儀：《試析星雲大師「菩薩性格」的論述—以《貧僧有話要說》為例》，嘉義：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年 6 月。

